

PART 1

.....

政治外交

第一章 從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看習近平改革路線

第二章 「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發展與挑戰

第三章 中國在南太平洋重掀波瀾

第四章 毀譽參半的中國「一帶一路」

第（一）章 從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看習近平改革路線

龔祥生 *

壹、前言

原本外界推測中共會依照慣例在 2023 年 10 月舉辦二十屆三中全會，但卻延遲至 2024 年 7 月才召開。2023 年時，外界舉出延遲的原因包括中美領導人會面未取得重大成果、中國經濟正面臨困境、被撤銷中央委員遞補人選未定等等。現在回頭來看，也或許是為了配合有「改革開放總設計師」之稱的鄧小平 120 週年冥誕而選在 2024 年舉行，既配合了中共前領導人的逢十誕辰，又符合深化改革的政治主軸。而過往的三中全會在中共黨史中有其特殊的重大意義，如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進行改革開放、第十四屆三中全會則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習近平掌權後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則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和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這些重大三中全會的特色，無論重點是在政治路線或是國家體制，都是和中共念茲在茲的改革相關。本文認為二十屆三中全會是作為觀察習近平改革路線的重要指標，既可與鄧小平路線相對照，也可以從此次全會觀察習如何總結自己任內既有的改革和如何規劃未來方向。

考量習近平的全面深化改革乃是延續自鄧小平，因此本文必須以少許篇幅簡略回顧鄧小平所設計的改革開放路線，接著整理習近平掌權之後所實行的深化改革內容，對照其所承繼自鄧的部分為何，再進入到本次二十屆三中全會的改革重點，觀察習的改革路線在此之後將走向何方，以及比較和鄧小平路線的異同。

* 龔祥生為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員。

貳、鄧小平所設計的改革開放路線

一、以漸進式改革防止既得利益者反彈

中共雖然於 1956 年中共八大時定調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階級鬥爭，而是落後生產力與先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矛盾，並想要以此調整政治經濟路線，但因為毛澤東的個人政治偏執並發動文革重回階級鬥爭路線，直到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成為中共第二代領導人後，才能重新回到八大路線。但礙於文革以來的左傾路線和既得利益者，鄧小平必須用不會立即觸動中共基本路線、所有制、權力結構的漸進方式進行經濟改革，如同時允許公 / 私有制、計畫 / 市場經濟，使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可同時互為體用，以此打破二元對立。¹

對當時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改革派而言，如何走出文革後的經濟困境才是最優先的事項，但必須在防止左翼勢力和計畫經濟下既得利益者反撲的前提下，才能確保後續開放資本主義市場的改革方式不會變成保守派政敵用以攻擊的話柄。所以鄧採取漸進方式以保留計畫經濟為前提，增加非公有經濟在市場中的總量，藉以達成「增量改革」，確保改革開放的範圍和衝擊不會過於迅猛，並用以說服黨內左傾勢力過往的計畫經濟和公有制仍然續存，然後期待未來隨著經濟發展能夠從量變達成質變，最終促使中國經濟達到現代化。

二、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解放生產力

鄧小平早在 1979 年 3 月 30 日中共「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就已提出「中國式現代化」一詞，再於 1982 年中共十二大提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並修正中共黨章中的總任務為：「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² 等於

¹ 李英明，《閱讀中國：政策、權力與意識形態的辯證》（台北：生智，2003 年），頁 133-134。

² 〈中國共產黨章程（1982 年 9 月 6 日十二大通過）〉，《共產黨員網》，2021 年 9 月 27 日，<https://fuwu.12371.cn/2012/09/27/ART11348715767823434.shtml>。

是要以「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進一步完成上述「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後來為了擺脫中共黨內對於開放資本市場和走向自由化的批評，鄧小平在南巡時定義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³亦即凸顯出生產力發展的重要性，藉以合理化開放以及利用資本市場的做法，並點出終極目標是「共同富裕」。1992年中共十四大時進一步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定義為「實現全黨工作中心向經濟建設的轉移，實行改革開放，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相結合」。⁴故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至十四大的改革開放路線，是逐步成形而非一步到位的，且愈來愈明確要在確保中共持續領導下，利用開放資本市場來達成經濟生產力的提升。

這種以經濟為中心而工具化資本市場的做法，其實打破了中共自毛時代以來的兩個重要政治信仰：公有制和自力更生。前者是進入計畫經濟時代以來，中共經濟發展的重要舉措，無論是工業生產或是農業集體都在公有制下運作，但改革開放允許私有制並引入市場機制，使得所有權和價格都被迫面臨改變，並造成既得利益者被迫面對競爭。自力更生則是在韓戰以及中蘇論戰後所不得不的選擇，因為當時中國面對國際孤立，所以只能以自力更生的方式進行建設和技術研發。⁵但鄧考慮到文革後的中國經濟現代化，已到了不得不引入國際技術以及資金的時刻，因此必須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合理化必要的開放政策。

³ 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鄧小平紀念網》，2017年1月19日，<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17/0119/c410539-29036090.html>。

⁴ 〈中國共產黨章程（1992年10月18日十四大通過）〉，《共產黨員網》，2014年12月24日，<https://fuwu.12371.cn/2014/12/24/ART11419399356558735.shtml>。

⁵ 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著，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423-424。

參、習近平掌權後的改革路線

在鄧小平之後，歷經江澤民、胡錦濤二任領導人後得到大位的習近平，已可算是中共第五代領導人。他初期的弱勢來自於並非如江、胡二人是由鄧小平所指定的接班人，但他上任後很快地就將弱勢轉為強勢，以打貪腐、依法治國、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等方式清掃江派人馬以掌控權力，並在中共十九大正式成為黨的核心，將其權力地位定於一尊。在這過程當中，他也是持續更新黨建理論，並強調自己支持改革開放，以使自己能夠自鄧小平取得更多的政治遺產和正當性。習執政初期就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樹立深化改革的旗幟，號稱延續了鄧小平漸進改革，但在做法上，卻是先肯定公有制的主體性，接著又在遭到美國科技圍堵後，不得不走回自力更生，逐步將改革開放走上了回頭路。

一、習近平的「第五個現代化」與「中國式現代化」意涵

習近平於 2012 年中共十八大掌權後承繼鄧小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並持續「中國式現代化」改革路線。習近平為展現延續改革的決心，於 2013 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並提出被稱為「第五個現代化」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⁶而從「第五個現代化」的六種意涵中，就可

⁶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圍繞著 6 種體制的改革：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深化社會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態文明制度；提高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準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詳見《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站》，2013 年 11 月 19 日，<http://www.scio.gov.cn/32344/32345/32347/32756/xgzc32762/Document/1415757/1415757.htm>。

以發現習近平並不只滿足於延續鄧小平的改革路線，他希望與經濟發展同步更全方位地提升中共以黨領政和國家治理的能力，而這和習所注重的「總體國家安全」也是相互呼應的，而不僅僅是專注在持續經濟現代化或是經濟失衡的弊病。習在 2014 年中共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時所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中，就納入了經濟安全，並提到「既重視發展問題，又重視安全問題，發展是安全的基礎」。這代表他在注意到失衡弊病的同時，將其上升到總體安全的層次去處理。

習近平在 2017 年中共十九大時乾脆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冠上自己的名，成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並寫入黨章，自此習思想與社會主義密不可分，再將中國現代化的目標設定為「到 2035 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接著在 2021 年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 週年大會時宣告已達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由於鄧小平是首先用「小康」來詮釋「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領導人，並明確提出到 20 世紀末「在中國建立一個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因此，當小康社會宣告建成後，代表習近平認為已基本完成了鄧小平以來經濟現代化的中程目標，接著就必須調整腳步以避免過去一味追求發展的「唯生產力論」繼續占據主軸，而是應該把經濟實力轉變為綜合國力，且必須是在國家治理能力同步現代化的前提下繼續發展，如此才能避免脫出黨國體制掌控的情況出現。2022 年中共二十大時，習近平定義當前中共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且將「中國式現代化」納入黨章修正案中。⁷ 綜合而言，習近平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意涵乃是承襲鄧小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下的改革路線而來，除了都堅持由中共領導國家現代化過程之外，更強調中共必須與時俱進地完善多方位黨國治理能力，尤其是超出經濟領域以外的現代化，這種要求是針對過往幾十年來發展失衡甚至可能失控而提出。

⁷ 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鬥——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22 年 10 月 16 日）〉，《人民網》，2022 年 10 月 26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2/1026/c1024-32551597.html>。

二、提出「共同富裕」與「國進民退」的政治考量

隨著中國採取漸進的「增量改革」方式逐步進行經濟現代化的同時，雖成功使中國攀升至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但也逐步擴大了發展不均的問題，且這樣的不均已經不只是區域、城鄉、貧富差距等「三差問題」，到了習近平時代更進入到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間的差距問題。此產業間的結構差距，製造了一批靠著網路虛擬經濟致富的新興產業巨頭，如阿里巴巴、騰訊等集團，但中共所堅持的管制無所不包會限制到這些新創產業的發展，也因此造成這些產業常挑戰中共的各種管制作為。至此，習近平不但要面對幾十年來的發展失衡，還多了新興民間資本挑戰政府權威的問題。

習近平為專門克服發展失衡的問題，早在 2017 年中共十九大的黨章修改時，將原來黨章總綱中「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修改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間的矛盾」。⁸ 隨著中共在 2021 年建黨百年時宣布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後，意味著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解決了基本的溫飽和貧困問題，接著可以更專注於解決發展失衡的問題。

為了多面向地解決自改革開放以來的各種環境、經濟、官民資本、實體和虛擬經濟、區域失衡等矛盾，習近平將「中國式現代化」作為實現目標的手段，並在中共二十大時對黨章進行修改，將「共同富裕」放在 2022 年的中共二十大報告中，並包含在「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個面向中：「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⁹ 習所列舉的這五個現代化面向呼應了幾乎所有失

⁸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共產黨員網》，2017 年 10 月 24 日，<https://www.12371.cn/2017/10/24/ART11508832982612968.shtml>。

⁹ 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鬥——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22 年 10 月 16 日）〉，《人民網》。

衡問題的實質和精神層面，因此必須配合「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使黨國體制既向其個人權力集中又能夠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其背後的政治邏輯就是既要平息因發展失衡長期累積的民怨，也不允許任何民間單位因不滿而挑戰中共黨的領導權威，而「共同富裕」正是十分適合用以平息民怨的大義名分，可以拿來凸顯中共當局重視現代化但又沒有忘記貧富不均的事實。例如「國進民退」是國家藉由對私有大型資本集團進行整改而得以實行，除了能夠將這些逐漸擴張到富可敵國的新興虛擬經濟重新納入國家資源調動體制內，也可以讓那些長期不滿中共當局過多管制限制發展的聲音止息，阿里巴巴集團在被整改後，馬雲就安靜許多，即為顯著例證。

然而，無論是「共同富裕」或「國進民退」，除了引發市場信心的擔憂外，更引起了「再毛澤東化」的疑慮。學者吳玉山認為目前習近平統治下的「再毛澤東化」是中共政權的返祖（atavism）現象，原因有三，首先是權力反向集中往習近平個人身上，這與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是相反的；其次是中國的制度化出現倒退；第三，黨國對於社會控制不斷加強。但也有反對意見如吳國光認為毛和習取得權力方式和所處環境大不相同，故無法相對比；此外，習近平其實更接近鄧小平而非毛，因為習將一黨專制與市場經濟融入全球經濟這兩者相結合，毛則是自外於全球經濟體系。故綜合而言，即便習的作為有「再毛澤東化」的疑慮，但他認為習仍然強調深化改革並強調承繼鄧小平路線。

肆、二十屆三中全會下的深化改革之路

中共在經歷過中美貿易戰、新冠疫情等衝擊後，整體經濟形勢已經和習近平執政初期有很大的變化。面臨來自美國的科技圍堵和產業鏈脫鉤後，帶來了產業和資金外移的趨勢，這卻是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都賴以成長的重要因素。再加上經濟成長趨緩以及股市、房市下滑等連動效應，使得中共當局面臨了內憂外患的處境，也因此使得中共當局更加重視這些危機對其政權所帶來的威脅。故從二十屆三中全會當中，可以看出面

對上述危機的當下，中共所選擇的政策方向將更加重視維護總體安全和自身政權。

一、繼續加強中共對改革的領導

2024 年 7 月 15 日中共召開二十屆三中全會，主題是「研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問題」，通過《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全文分三大版塊，第一部分為總論，闡述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意義和要求；第二部分至第十四部分為第二板塊，主要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國家安全、國防和軍隊等方面部署改革；第十五部分為第三板塊，主張加強黨對改革的領導、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當中設定了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¹⁰

繼續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到 2035 年，全面建成高水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為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奠定堅實基礎。

這段文字所設立的目標延續自十九大而未改，但再增加制度面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等文字，以凸顯出以完善制度面充實其「依法治國」的內涵。《決定》也設立了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則：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守正創新、堅持以制度建設為主線、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堅持系統觀念等六項原則。這當中透露出堅持中共領導和社會主義才是中國要走的現代化道路，這也充分表現出中共對社會主義體制的制度自信。如二十屆三中全會開幕當天《人民日報》評論部所署名的〈必須

¹⁰ 〈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二〇二四年七月十八日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人民網》，2024 年 7 月 22 日，<http://dangjian.people.com.cn/n1/2024/0722/c117092-40282216.html>。

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人民觀點）》文中，突出「制度競爭是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方面，制度優勢是一個國家贏得戰略主動的重要優勢」。文中還引用習近平所說「必須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是兩句話組成的一個整體，即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¹¹ 再加上《決定》第十五部分的標題即載明「提高黨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領導水平」，故可以解讀為二十屆三中全會的目的是持續堅持中共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面的前提下進行改革，最終目標是在現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進一步解放社會生產力和創造力。

進一步將 2024 年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與 2013 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相互比較，可以發現在政治意義上的差異性。首先，《決定》並沒有再如前一版提及深化改革開放需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1987 年 10 月召開中共十三大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並在大會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特指我國生產力落後、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經歷的特定階段。」因此可以推估，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時已經進入了全面脫貧後的小康社會，也因此不必再強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其次，《決定》雖然承繼之前 2013 年版提到「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但未再強調「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故可以解讀為，保留中國政府擴大在市場經濟中進行干預的可能性。

二、多面向的安全考量

從前述鄧小平的改革路線來看，其所重視的是如何引進資本主義市場和資金技術，以幫助中國經濟的現代化，而僅就政治安全方面提出「四個

¹¹ 《人民日報》評論部，〈必須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人民觀點）〉，《人民日報》，2024 年 7 月 15 日，<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24/0715/c64387-40277905.html>。

堅持」，以確保中共領導地位不會因為改革開放而被稀釋掉。然而，到了習近平時代，除了經濟現代化以外，認為要改革或要追求安全化的領域就不僅僅於政治安全了。參考二十屆三中全會後才公布的〈關於《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的說明〉（以下簡稱《說明》），以習近平為署名，內容闡述其推動深化改革和「中國式現代化」的四個考慮、¹²起草過程和內容特點。習在《說明》提出的四個考量都十分實際，並點出了時間上的迫切性、提升治理能力的必要性，但最重要的還是第三點發展失衡對社會造成的矛盾和第四點對中共黨國體制所造成的重大風險。但瞭解問題和解決問題是兩回事，首先是來自內部的矛盾，如同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必然路徑一般，隨著改革開放的時間越久，得到最大經濟果實的私營企業主和官僚資本家都不會願意跟一般人共享，因此這樣的矛盾難以解決。其次是來自外部風險，特別是來自美國的經濟打壓和科技圍堵，中國自身核心技術在中美脫鉤後已遇到瓶頸，因此短期內中共難以用內部改革和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方式去克服。

此外，《決定》的第二板塊，多面向地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國家安全、國防和軍隊等方面闡述各領域安全及現代化進程。可見中共最為擔心的還是安全問題，所以在內文中強調黨內要做到兩個確立和兩個維護，並關注總體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全風險網絡，也要堅持以黨領軍，而和改革最有關的經濟發展部分在篇幅上是與上述其他安全等量齊觀的一部分而已，但這些對中共而言都是要牢牢抓在手上並與深化改革相互適應。

¹²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四方面考量：第一，這是凝聚人心、匯聚力量，實現新時代新征程黨的中心任務的迫切需要；第二，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迫切需要；第三，這是推動高質量發展、更好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迫切需要；第四，這是應對重大風險挑戰、推動黨和國家事業行穩致遠的迫切需要。詳見習近平，〈關於《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的說明〉，《人民網》，2024年8月15日，<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24/0815/c64094-40299515.html>。

三、突出國有企業在市場中的作用

從鄧小平決定改革開放起，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一向就是中共政府不得不謹慎處理的議題，在二十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習近平於 2024 年 6 月 1 日《求是》雜誌署名發表〈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品質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著力點〉一文，此文指出新質生產力的顯著特點是創新，既包括技術和業態模式層面的創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層面的創新，包括五個面項：第一，大力推進科技創新；第二，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將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第三，著力推進發展方式創新，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第四，紮實推進體制機制創新；第五，深化人才工作機制創新。¹³ 此文關注到目前發展所受到的限制，尤其是核心技術受制於人、分配差距大等客觀因素，關於黨政幹部的問題在於一遇到矛盾和困難又習慣性回到追求粗放擴張、低效發展的老路，或是以「新瓶裝舊酒」方式應對。此外，由於二十屆三中全會討論深化改革的議題，這也是該文章第四點所著重論述的，當中提到「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係。新質生產力既需要政府超前規劃引導、科學政策支援，也需要市場機制調節、企業等微觀主體不斷創新」，這代表中共仍會把持科技創新發展的主導權，持續以「舉國體制」集中力量幹大事。但這已證明無法突破當前核心技術被「卡脖子」的困境，也很難讓外資企業相信中國有擴大對外開放而不會掠奪資金技術。另一方面，原本外界預期中共會趁二十屆三中全會將新質生產力做出更詳盡的定義和釐清，但綜觀《決定》全文，新質生產力也僅出現短短三次，可見現階段相關論述還並不十分充足。

二十屆三中全會也持續在發展政府和市場關係的論述，在《決定》的第二部分「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提到要「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仍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主要任務是完善有利於推動高

¹³ 習近平，《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品質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著力點》，《求是》，2024 年 5 月 31 日，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4-05/31/c_1130154174.htm。

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¹⁴但 2013 年版有明確提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在《決定》對公有制卻沒有這樣肯定的敘述，而是改以「兩個毫不動搖」替代，並僅僅將公有和非公有等量齊觀。這或許是考量到現今中國外資逐步外移，為重新吸引外資而做出的政策宣示，避免國際對於中共是否會走向左傾的疑慮再起。此外，這段話看似將公有制和非公有制放在公平競爭的地位上，但後面的文字卻又獨厚公有制經濟體，強調「推動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增強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競爭力。……推動國有資本向關係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向關係國計民生的公共服務、應急能力、公益性領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戰略性新興產業集中」。這段話其實才是習近平改革中的重點，將國有企業朝向目前最有發展前景的前瞻性戰略性新興產業集中，甚至是直接藉由整改收割那些高新產業，以維護國家安全和公益性的名義，盡可能擴大國有企業所能掌控的資本。故總結而言，擴大國有企業在市場中的作用就是擴大公有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而這也是走上了改革開放的回頭路。

伍、小結

習近平於 2024 年 8 月 22 日盛大舉辦「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 120 週年座談會」以及一系列追思鄧小平的活動。即便過往領導人「逢十」誕辰的確會有較大規模的活動，但這次很明顯是為了延續二十屆三中全會深化改革的主旋律而擴大高調舉辦。目的是將習近平的改革地位向上承接自鄧小平，甚至足可在新時代中與鄧比肩的地步，因此習在紀念會上不斷高捧鄧

¹⁴ 「兩個毫不動搖」：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

為「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創者，鄧小平理論的主要創立者，為世界和平和發展做出重大貢獻的偉大國際主義者」，¹⁵而之前中共官媒也曾出現將習吹捧為「改革家」的文章，雖然該文後來被刪除，但可以想見習近平是想將自己與毛、鄧二人並列於中共黨史偉人之列。另一方面，習也為了避免「再毛澤東化」的疑慮持續被放大，近期更努力向鄧小平路線靠攏，以挽回外資信心。

再從上述所梳理出的鄧小平改革路線和習近平的改革路線相比照，可以發現雖然習近平一直期望承繼鄧小平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地位，但是鄧小平以漸進方式增加私有制和引入市場所達成的增量改革，到了習近平手中卻反其道而行，變成了強調國企在市場中作用的「國進民退」，反而增加了公有制在市場中的比重。而鄧和習二人同樣是依靠開放國內市場引進國外資金技術以促進中國經濟和科技現代化，但習任內大吹大擂「中國製造 2025」、「中國標準 2035」等等引起了歐美國家的戒心，最後美國終於在川普上台後忍不住發動貿易戰作為反制，誠可謂咎由自取。鄧和習兩者的共通點在於，都堅持中國共產黨對整個改革的領導，只是到了習時代更加強了以國家安全為名的管制，但卻因此引發外資疑慮。

最後，本文梳理習近平的改革路線，在二十屆三中全會之前，已經藉由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樹立自己延續自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再加上黨和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作為他個人的新改革目標，然而在面對多年來發展失衡的弊病時，卻開始打著「共同富裕」的旗號逐漸走上了擴張公有制的回頭路，逐步收編私人資本以擴大國有資本，美其名是為了在嚴峻的國際環境中維護國家安全，但實質上卻是賦予「國進民退」正當性，並載明於二十屆三中全會所通過的《決定》中。故總結而論，外界失望於二十屆三中全會並未拿出有效刺激中國經濟的舉措，乃是源於無法認清習近平挾著國家安全之名不斷走回頭路的事實，筆者認為其改革的最終目標並不在於改善總體中國經濟

¹⁵ 習近平，〈習近平：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 120 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網》，2024 年 8 月 22 日，<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24/0822/c64094-40304315.html>。

環境，而是加強中共對國家無所不包的各領域掌控能力，雖仍需要加強經濟和科技的增長，但那些必須轉化為國力並專為中共所用才有價值，如此才能夠確保黨和其個人執政的安全。